

大学宿舍设安检 要管理也要温度

大学生进宿舍要安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暨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引发热议。该通知称，“为杜绝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全体学生生命财产安全，自2025年12月1日，物业工作人员将在各宿舍楼出入口通过金属探测仪等设备对携带包裹进行安全检查，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管制刀具等危险品进入宿舍区域”。

进宿舍安检，有“过度管理”之嫌

学校加强学生宿舍消防安全管理的出发点没有错，但是，是否采取安检这一做法，首先要看是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安检的相关法规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中有所差异。一般来说，航空器、列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运输的安检都有相应的法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站、公路长途客运站、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

大学生宿舍楼这样的一般设施，显然不属于以上必须进行安检的场景范围。在缺乏相关法规授权支持的情况下，对学生进出宿舍楼进行安检，可能涉嫌“过度反应”，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可探索其他管理手段，培养学生自主安全意识

站在“安全最大化”的角度，学校此举似乎也是情非得已。可是仔细推敲，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高校宿舍管理当然要保障安全，问题在于怎么做综合效果最好。

就常理来说，将电动车电池带回宿舍充电是麻烦的。如果校园里有便利、安全的充电场所，学生完全没必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反过来讲，如果把投入在安检上的资源，用于建设充电场所，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充电的需求，或许也能有效避免将电池带回宿舍的情形。所以，学校为什么突然出台宿舍安检这样的举措，有没有穷尽其他管理手段，还是应该做出进一步说明。

安检应该是安全管理措施中“最后的办法”，其释放的就是“不信任”的信号，在校园这样的内部场景中，尤其应该谨慎使用。如果天天把学生群体当“坏人”防着，很容易制造管理者和学生的对立。

即便坚持安检措施，学校也应该做好沟通说服工作，比如组织召开有



对大学生宿舍进行安检，成本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每个宿舍楼都配备金属探测仪等设备，需要多少费用？在每个宿舍楼出入口，都配备安检人员，需要多少人员？这些费用由谁来出？这是必须核算清楚的。

据报道，该校将长期执行这一政策，那么，安检费用就将是一项长期支出。这必然会挤占学校对教育教学的投入。

不可否认，大学里确实存在有的学生在宿舍违规使用电器等问题，不少学校都曾通过入室检查、收缴违规电器等方式，治理这一问题。暨南大学此次的做法则更进一步，引入类似机场、高铁、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措施。但是，学校、学生宿舍并不是机场、高铁、地铁，需要“高度防范”。大学不妨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更该投入的地方，这也是教育管理精细化的应有之义。

学生代表参与的听证会，详细解释学校的考虑，并且确保在流程上保障学生的隐私，减少长时间排队等现象。

宿舍安检之争反映了当代高校管理中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高校肩负着对学生生命安全的责任，任何一起安全事故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高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包括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过度管理可能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从根本上说，安全管理的最佳路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安全意识，而非单纯依靠外部强制。通过安全教育，让学生真正理解安全规章的重要性，从而自觉遵守，这远比被动检查更为有效。只有当每位学生都成为安全管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校园安全才能得到真正保障。

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管理挑战，高校管理者不妨多些“治未病”的思维，通过完善设施、加强教育、建立机制，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

综合新京报、红星新闻、齐鲁晚报等

全县“吐槽大会”的真正看点在于“会后功夫”

□ 徐刚

据媒体报道，近日，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主持召开全县“吐槽大会”。会议以“吐槽”为形式，以“整改”为目的，20家发言单位重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进行限时“吐槽”发言。

在基层政治生态中，专门召开以“吐槽”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次积极的形式创新。长久以来，不少地方会议习惯于展示成绩、回避问题，导致一些真实矛盾被掩盖在皆大欢喜的表象之下。霍邱县主动设置“吐槽”环节，让各部门直面问题、畅所欲言，这种直面矛盾的勇气值得肯定。

“吐槽大会”的价值，首先在于构建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对话场域。在限时发言、聚焦问题的规则下，各部门能够跳出日常汇报工作的套路，直接指出工作中的实际困难。更深层次看，这种会议形式的出现，反映了地方治理理念的转变。从强调“成绩单”到主动曝光“问题单”，从追求“表面和谐”到鼓励“建设性批评”，体现的是更务实、更开放的治理思维。

然而，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吐槽大会”能否真正推动问题解决，关键在于“会后功夫”。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创新形式在初期轰轰烈烈，最终却可能流于“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的

窠臼。会场上吐槽的问题，是否能在会场外得到实质性解决？吐槽之后的责任落实、跟踪督办、效果评估机制是否健全？这些后续环节往往决定了一项创新能否从“会议景观”转化为“治理实效”。

从宣传角度看，“吐槽大会”这一称谓本身具有亲和力与传播力，易于引发公众关注。但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形式化风险。当“吐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表演”，当尖锐批评被精心包装为不痛不痒的建议，那么这种创新就可能偏离初衷。真正健康的批评氛围，应植根于日常工作机制，而非依赖特殊的会议形式。

“吐槽大会”不应止于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应拓展为连接群众关切的渠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人民群众感受最为直接、最为深刻。如何将体制内的“吐槽”与群众的诉求表达有机结合，形成内外联动的治理改进机制，或许是这一创新形式可以深化的方向。

基层治理现代化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包装，关键在于能否直面真实问题。当更多地方敢于撕下“政绩面膜”，当问题意识真正成为治理基因，中国基层治理必将迎来更富活力的新篇章。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制度保障下的持续实践与不断深化。

家长成“打印员”，折射家校边界与政策执行症结

□ 曲征

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并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明减暗不减”，频繁将“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家长打印，多的时候一晚上得打印几十页，令人抓狂。这一操作不仅导致学生减负难，家长下班后也疲于看群，生怕一时疏忽耽误孩子作业进度。

“一上小学就买打印机，8天假期打印60张作业”，微信作业打印潮让家长沦为“后勤专员”，这不仅是教育减负的失守，更折射出数字时代家校边界模糊与政策执行僵化的深层症结。

家校边界的隐形错位，是问题的直接病灶。教育部门明令禁止手机布置作业，却异化为“微信发图、家长打印”的变相转嫁。家长的精力消耗远超经济成本，紧盯群消息、抢修打印机、奔波打印店成为日常，甚至探亲都要携机随行。这种“校内责任家庭化”的倾向，违背了“双减”减负学生、松绑家长的初衷，更模糊了学校教书育人的核心职责。

政策执行的“一刀切”则是根源所在。“一科一辅”政策本为规范教辅乱象，却在部分地区异化为机械教条。目录制定调研不足、动态调整缺失，导致教辅无法适配学情变化。比如，

初三需切换教辅类型却无法补订，而教师多本教辅则被指违规，倒逼其拍图打印。

破局之道在于构建“柔性政策+责任归位”的治理体系。其一，建立“动态化”教辅管理机制。“一科一辅”不应是“一劳永逸”的目录，而是要根据学段、学期、学情动态调整。可定期征求教师意见，删除老旧题型、补充分层材料，让目录教辅真正匹配教学需求。同时，为学校预留“自主补充额度”，允许教师根据班级情况采购或印制少量辅助材料。

其二，明确“权责对等”的家校边界。学校需承担起教学物料准备的主体责任，将校本作业打印纳入日常教学保障，简化审批流程；教育部门则应升级监管手段，让隐蔽的违规作业无处遁形。家长的角色是“教育参与者”而非“教学执行者”，当学校切实承担起打印、分发责任，“打印机焦虑”自然迎刃而解。

“背着打印机回老家”的荒诞困局警示我们，教育减负不能止步于“禁止某项行为”，更需打通政策善意与教学实际的“最后一公里”。唯有让政策更具弹性、责任回归本位，才能让“双减”真正落地为学生的轻装上阵，而非家长的“打印攻坚战”。